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民族学 五十年

主 编 宋蜀华 满都尔图

1949-1999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民族学五十年

主 编 宋蜀华 满都尔图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彦青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学五十年/宋蜀华 满都尔图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

ISBN 7-01-004157-1

I. 中… II. ①宋… ②满… III. 民族学-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0442 号

中国民族学五十年

ZHONGGUO MINZU XUE WUSHI NIAN

主编 宋蜀华 满都尔图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434 千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4157-1 定价:31.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编 委 会

主 任 宋蜀华

编 委 马 戎 马启成 王 平 王庆仁

白振声 李绍明 祁庆富 陈国强

杨圣敏 宋蜀华 何星亮 何耀华

纳日碧力戈 张江华 施联朱

夏之乾 翁家烈 黄淑娉 覃乃昌

满都尔图 潘乃谷

秘 书 彭 爽

《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由中国民族学学会组织在京的部分民族学专家撰著,作者分工如下:

宋蜀华 绪论

祁庆富 上篇第一章

施联朱 上篇第二章

满都尔图 上篇第三、四章,结语

白振声 上篇第五、六章

何星亮 下篇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

王庆仁 下篇第十三章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篇

1949—1976

第一章 中国民族学的新开端	(19)
第一节 1949 年以前的中国民族学	(1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传播与延安时期 的民族工作	(30)
第三节 民族访问团的民族学考察	(43)
第二章 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	(53)
第一节 识别民族的依据	(54)
第二节 民族识别的进程	(68)
第三节 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识别	(74)
第四节 民族识别工作的意义	(96)
第五节 民族学工作者的贡献	(100)
第三章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08)
第一节 开展调查的背景及任务的提出	(108)
第二节 以社会形态为核心的前期田野调查	(111)
第三节 以编写史志丛书为核心的调查研究阶段	(123)

第四节	成就与教训	(132)
第四章	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	(143)
第一节	社会性质的应用性调查研究	(144)
第二节	原始社会形态研究	(150)
第三节	奴隶制社会形态研究	(163)
第四节	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研究	(172)
第五章	民族学研究机构	(180)
第一节	开创时期的民族学研究机构	(180)
第二节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与中国民族学学科 地位的确立	(182)
第三节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建立及其工作 中心和发展方向	(189)
第四节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	(194)
第五节	全国各地民族学研究机构的状况及主要 任务	(200)
第六节	民族博物馆建设	(205)
第七节	人才培养	(213)
第六章	对外学术交流	(219)
第一节	与苏联民族学界的学术交流	(220)
第二节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交流	(230)
第三节	苏联民族学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	(232)

下 篇

1977—1999

第七章	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人才培养	(249)
-----	----------------------	-------

第一节 民族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250)
第二节 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258)
第三节 人才培养	(271)
第八章 田野调查	(282)
第一节 全国性的民族学调查	(282)
第二节 区域性的民族学调查	(287)
第三节 新时期民族学调查的特点	(303)
第九章 研究领域的拓展 主要科研成果(上)	(306)
第一节 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	(306)
第二节 民族志研究	(314)
第三节 社会形态研究	(318)
第四节 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研究	(330)
第五节 原始宗教研究	(338)
第十章 研究领域的拓展 主要科研成果(下)	(344)
第一节 习惯法和民俗文化研究	(344)
第二节 现代化与民族繁荣发展研究	(348)
第三节 汉民族研究	(354)
第四节 影视人类学研究	(360)
第五节 都市人类学研究	(363)
第六节 新时期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特点	(365)
第十一章 学术活动和对外学术交流	(369)
第一节 学术活动	(369)
第二节 对外学术交流	(381)
第十二章 台湾和香港的民族学研究	(394)
第一节 民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	(394)

第二节	民族学研究的分期	(405)
第三节	高山族及平埔族社会与文化研究	(410)
第四节	台湾汉族社会与文化研究	(425)
第五节	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434)
第六节	区域和海外华人研究	(445)
第七节	社会科学中国化途径探讨	(452)
第十三章	中国民族学的展望	(458)
第一节	重视田野调查,产出更多高质量的调查 成果	(459)
第二节	加强应用研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 大作用	(462)
第三节	加强理论建设,提出更多有创意的学术 思想和理论	(466)
第四节	坚持国际化与中国化并行的方针,建立 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	(471)
第五节	重视定量研究,使研究成果质量更高	(477)
第六节	加快互联网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数据库的 建设	(479)
第七节	其他值得重视的发展方向	(484)
结 语		(496)
后 记		(498)
附 录		(500)
附录一:中国民族学学会简介		(500)
附录二:中国民族学学会历届理事会构成		(504)
附录三:中国民族学学会历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摘要)		(513)
附录四:中国民族学学会历次学术会议纪要(摘要)		(524)

绪 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①和共和国同步走过了半个世纪。在新世纪之初,对中国民族学在过去这半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的回顾以及对新世纪的展望,都是十分必要的。总结过去,有助于正确地认识现在和展望未来。这就是写作本书的目的。

——

为了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民族学走过的曲折道路和获得的发展,有必要扼要回顾一下20世纪前半期西方民族学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对于人类社会及民族与文化的认识,从西方传来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前者,蔡和森可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922年至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的起源》,便是根据恩格斯的民族学名著《家庭、私有制和

① 民族学一词,一般说来,欧洲大陆称民族学(Ethnology),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美国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除名称外,三者的学科史、研究对象、学派、方法论均基本相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惟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故本书在行文中有时对民族学、人类学并称。

国家的起源》一书。他的讲稿经过修订补充,于1924年正式出版,名为《社会进化史》。^①此书在三年内连出三版,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到1929年,杨贤江(笔名李膺扬)将恩格斯这本书翻译出版,名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②在国内思想界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30年郭沫若根据恩格斯的理论观点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我国古籍中关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内容加以阐释,被誉为使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观点研究我国古代史的典范。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了民族研究机构,对于民族问题、包括民族学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从1941年起出版过《回回民族问题》等书。

关于后者,蔡元培可说是将欧美民族学传入中国的奠基者。蔡氏于留学德国期间,曾潜心研究民族学。1926年他撰写《说民族学》^③一文,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以后又写了《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④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1928—1940),他力图发展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在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民族学组,并担任主任。他主张民族学不仅为理论科学,也是应用科学,重视田野调查。

西方民族学各学派传入我国的主要途径:一是“五四”以后一批青年学者如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黄文山、杨堃、李济、凌纯声、卫惠林、杨成志等学成归国后,利用所在的大学和学术机关,宣传介绍西方民族学。二是各派主要著作的译述出版,如摩

① 参见《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杨堃:《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③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 《社会学刊》,第1卷,第4期,1930年。

尔根的《古代社会》、罗维的《初民社会》。这些书的出版使民族学知识走出了校园和学术机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民族学各流派先后传入我国者,有进化学派,德奥民族学派即传播学派,美国批评学派即历史特殊论学派,法国民族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等。

应当指出,留学归国的民族学者,一般说来,虽各有研究取向,但都能合作共事。这一特点和优点,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表现尤为突出,往往在一所大学或学术机关兼有出身于不同学派的学者。尽管如此,由于理论倾向和研究取向有所不同,总的说来,形成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及其一些学生,受欧美较早学派的影响,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少数民族,多研究其传统文化,偏重于民族志的描述,较不重视理论概括。这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多在我国南方。另一种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形成的研究传统,理论上偏重于较晚传入的功能学派,研究上重视实际应用,研究对象则多为汉族农村,也有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南北两方形成各自的特点,民族学界中也有称为南北两派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有起有伏,直到作为一门学科曾被取消,后来又重新恢复并获得显著的发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种生态环境的国家,即使在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的时期,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仍然没有完全中断。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首先,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得到进一步

确认。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因此,把中国各民族首先是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是中国民族学的主要任务。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在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把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则是不全面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少数民族研究。否则,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中,就体现不出汉族的重要作用,以及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性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汉族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还有,国外民族特别是与我国邻近的民族自然是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领域,在今天,处于开放性的世界格局中,对国外民族的研究自然是不可少的。然而,为少数民族服务,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仍然居于主要地位。

其次,20世纪50年代也是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民族学的确立时期。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研究民族及其文化必须具有发展、演进的动态观点。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社会改革前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民族志资料,无不证明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东汉人袁康著《越绝书》卷11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这反映出社会生产力从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的飞跃,并为后来考古研究所证实。至于反映社会发展方面的资料就更多了。史籍中对我国原始社会的描述有所谓“长幼齐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①,这样的社会没有君臣之分,这种社会的家庭关系,也只能是

^① 《列子·汤问》。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①。至于社会改革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还存在着具有氏族制度、村社制度、奴隶制度、农奴制度等社会形态,无不证明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但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应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状况,进行具体分析,这才有利于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

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学工作者开始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例如,1950年林耀华和陈永龄带领燕京、北京、清华等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到内蒙呼伦贝尔大草原,对蒙古族和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进行调查,写出了有价值的考察报告。1951年费孝通深入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写出《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同年李安宅、林耀华、宋蜀华、王晓义等去西藏进行社会调查,对西藏社会性质属于农奴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为了适应民族工作的需要,1952年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集中了清华、燕京、辅仁、中山等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有关专门人才,开展包括民族学在内的研究工作。各地成立的民族学院也先后开展了民族研究工作。北京、厦门、中山、云南等大学开设了有关民族学的课程。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民族学专业,开设民族学研究班,聘请了苏联民族学专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切博克萨洛夫来校讲学,该班学生迄今多已成为对民族学研究有贡献的学者。至于有关民族学的刊物,如《民族问题研究丛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以及《民族问题译丛》等也先后出版,登载民族学、民族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方面的文章,连载专著以及苏联民族学研究的译文。厦门大学设立了人类博物馆,一些民族学院也建立了民族文物室(现已扩建为博物馆)。

^① 《庄子·盗跖》。

为了弄清我国究竟有多少民族,以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及实现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大批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了由中央和地方民族工作机关组织、领导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弄清了我国现有若干少数民族,为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少数民族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结构以及传统文化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各大学和科研机关的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文艺工作者都积极参加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分赴民族地区,不到两三年便搜集、整理了近两千万字的资料。这些资料结合有关历史文献,成为社会改革前各民族社会形态不可或缺的记录和宝贵财富,也为各民族社会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显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在为兄弟民族服务过程中获得了发展。在国家颁布的《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中,民族学列入了自己的规划项目。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民族研究所,民族学成为该所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所有这些成就,都说明民族学在20世纪5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正当民族学蓬勃发展的时候,国内政治形势逐渐向“左”的方面变化,影响所及,民族学和社会学一样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学科被正式取消,机构停顿,损失十分惨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后,才开始有了转机。

1978年2月,我国政府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各门学科的科学研究,也包括民族学研究在内。民族学恢复了合法地位。

1979年5月,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会上讨论了民族学的发展规划。次年10月,中国民族学研究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民族学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这给同行们以极大的鼓舞。学会成立以来,分别以民族学的学科建设、民族学与现代化学、传统文化与民族发展繁荣、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发表100周年等为主题,举行了多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12辑《民族学研究》论文集,出版了136期《民族学通讯》。这些工作促进了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学科的发展。

不少高等院校也先后成立了民族学系或人类学系^①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一些省区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民族学研究所。这些教学和科研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民族学专业人才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分别在一些高等院校建立了民族学、人类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陆续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的民族学、人类学专门人才。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也造就了一批出国留学、攻读民族学和人类学后返国的学者。他们带回来新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不论是国内学成或留学归来的民族学者,他们都同样是民族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生力军。各地有关机构和学者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学术交流和联系。这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探索我国民族学发展的最佳途径。

各地有关科研机构先后恢复或新建后,制定了规划,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民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下列主要成绩:第一,在国家民委组织领导下,编辑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其中有不少民族学著作。第二,出版了大型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

^① 文化人类学相当于民族学,为了行文方便,有些地方民族学、人类学并称。

书·民族卷》、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李毅夫等主编：《世界民族大辞典》等；出版了大量的民族学专著，包括教科书、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研究的专著论文及译著。国外民族学研究方面，除恢复出版《民族译丛》外，还陆续出版了《世界各国民族志丛书》以及其他专著和译著。第三，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正在各地开展，一般主题大都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及西部大开发问题。其中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的西南地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的民族地区系列调查以及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课题组”开始进行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系列调查”最为引人注目。

总之，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民族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然而始终没有脱离各民族的实际，可以说它是走的一条为中华民族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得到发展的道路。

三

面对新的世纪，中国民族学的前景、它的研究取向，必须置于新的世界格局中去审视。

当代民族学、人类学是世界性的科学，然而从历史角度看，它和其他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一样产生于欧洲，并首先出现于欧洲的大学体系中，应当说先天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把东方或非西方作为它的对立面。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人类学得到了全球性的传播。可以说，它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欧洲人面对有关问题而寻求的解决之道。民族学、人类学传统上主张研究异文化，所谓异文化实即非西方文化。它的各种理论，